

# 口述史视野下的民兵组织研究

□ 长治学院 赵艳霞

**摘要** 民兵口述史的产生是叙述者与访谈者双向参与,选择呈现的过程,其构成的复杂性与主观性提醒我们,在口述史使用过程中需保持必要的严谨与冷静。

**关键词** 口述史 民兵组织 太行根据地

中图分类号 G275.1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记录历史文献的方式之一,口述史的产生既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新史学”思潮孕育下的产物。在抗战史研究领域,抗战口述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已颇具规模,如日本侵华暴行口述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研究、国民党抗日时期正面战场的口述史研究及社会各阶层民众抗日斗争研究等。这其中既有传统史学所重点关注的政治军事史内容的口述调查,也有“新史学”影响下从底层社会视角进行的口述史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对民兵组织的研究是对社会史“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研究思想的实践和呼应。对民兵组织的考察是抗战史在底层视野下展开的积极探索,不仅可以深化根据地民众史研究,而且可以进一步构建立体化的抗战史研究内容。

将民兵组织作为历史学研究主题是对现有抗战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与现有抗战史其他主题相比,曾经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的民兵组织,在当下史学界的研究中格外单薄。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传统史学关注内容的局限。长期以来民兵总是以群体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更多时候民兵的功绩与价值被正规军团的光芒所掩盖。在传统史学中缺乏对民兵及其所代表的民众历史的关注。其次是传统文献记载的缺失。现有文献史料中,对民兵组织、民兵个人的记录着墨较少。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研究也多以涉及性研究和介绍性研究为主,缺乏对民兵组织的深入分析和整体把握,呈现出零散而粗浅的特征。

在传统史学缺席的情况下,转而求助于“边缘史料”就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必然选择。抗战时期民兵是战争的参与者,今天他们是这段历史记忆的持有者,民兵的历史在民众中以民众记忆的形式得以保存。因此,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民兵组织是开展民兵组织研究的必要手段。

## 二

1.通过口述史访谈为民兵组织研究获得了难得的史料。这些史料虽然不像官方文字史料具有系统性与完整性,但却从细节上丰富着我们对民兵组织的认识。例如有关站岗放哨问题:“白天是普通百姓站岗,到了晚上是民兵站岗。(白天)有敌情的时候就会按信号树。民兵站的是暗哨,到最暗的地方。”“晚上民兵是集合在一起的。只要有一个发现了敌情,就会立马通知所有的民兵。”“在夜晚执勤中,为了防止个别民兵偷懒开小差,民兵组织发明了找铁锹的方法:民兵“当时开会,训练,不开会就拧不成一股劲。民兵经常开会,晚上发的锹。干部白天藏锹,晚上让他们找锹。全街跑,挨家找。找到以后还要还给大队干部。”“他们找到了铁锹并不是要找这个东西,是想让你活动,来回走动,发现坏人。”<sup>[4]</sup>

2.口述者对于历史情境往往有着极富个人化的经历,由其叙述的历史表现出个人历史与大历史的重合与异化。1939年7月八路

军总部进驻砖壁村。时年11岁的萧江河见到了朱德总司令。“一天朱总和他的夫人来到学校找老师,老师领朱总进了教室。教室很破旧,学生的课桌就是用土垒的,板凳是小凳子。朱总就给大家讲要组织儿童团,任务是站岗放哨,必要时要为总部送信。”“之后司令让大家选一名儿童团长,举手表决,当时大家一致选我”;“总司令还去每位学生的座位上看了看,因为当时学校就在这个庙上,八路军总部要住这个庙了,把学校搬出来到老百姓家,总司令两个意思,一方面,要来组织儿童团,另一方面就是要看看学生们为总部腾出大庙后来这儿住的怎样,一看孩子们读的还是旧书,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看了以后总司令说你们读的这个书还是旧年代的书,在当时的抗战时期要读抗日战争的书,我让我们的印刷厂给你们印上新书,等过了几天,总司令专门派人来给我们送书,这个书是抗日读本,分两种,一种是抗日读本,是一二年级念的,三四年级是战时新课本,学校的学生们就开始读具有抗日内容的书。”<sup>[5]</sup>口述访谈既是对访谈者既有材料的深化与扩展,也是对个别问题的澄清与辨别。如在回答为何参加民兵时,一位大爷是这么回答的:“说不上为什么,那会儿敌人侵略咱这儿,村里组织民兵就参加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别人就参加了。自己想去就去,八百多口人才有二三十个民兵啊。谁想去就去,你不去也没人管。也没有什么待遇,事情也蛮多的。”<sup>[6]</sup>在口述访谈中,访谈者对某些问题的叙述与我们原有认知之间的差别,是历史多样性的表现,而对不同材料的比较是获得历史信息的重要途径。

3.口述史方法在民兵组织研究中的使用,是一种叙述视角多样化的尝试。叙述者通过语言表达历史,其语言的差异性与口头性给这段历史带来了丰富性与亲切感。对于民兵组织的口述历史,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不同身份的叙述者所叙述的内容也各有侧重。老民兵回忆回弹药抬伤员,老大娘回忆做军鞋,子女回忆民兵父亲帮助群众,妈妈一边抱怨一边带着他们转移的场景。这些叙述相对于传统历史而言,是一种不同声音,而且是一种长期被忽略声音表述。

## 三

我们在承认口述史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多元视角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民兵的口述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民兵历史叙述者的选择范围较小。受年龄限制,第一叙述者(事件亲历者)人数极少。在我们的两次民兵口述史调查中,前后共访谈73人次,其中年纪最大的92岁,80岁以上的30人。占总调查人数的41%。而在这其中,亲历过民兵活动的人仅占极少一部分。

2.叙述者所提供信息内容较单一。受叙述者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所叙述的内容主要以本人记忆、本家族事迹、本村情况为主。受叙述者年龄、认知水平的限制,所叙述内容常常有时间、概念的错误。如很多老人将抗战时期的民兵与解放战争中的民兵活动相混淆。

# 解读民国时期李叔同《送别》中的合唱音乐

□ 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谢 霜

**摘 要** 李叔同的《送别》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堂合唱乐歌,其简洁流畅的审美风格,深邃淡雅的审美意境,字里行间彰显着浓郁的民族特色。《送别》开创了中国合唱音乐史上的先河。

**关键词** 合唱 《送别》 音乐

**中图分类号** G275.1 **文献标识码** A

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中,李叔同《送别》作为其插曲或主题曲,一经问世,便以其清新雅致的格调,幽远深邃的意境,成为20世纪初期民国合唱乐曲史上最富盛名的乐曲之一。本文从李叔同《送别》入手,探索《送别》在音乐创作上的风格与成就,从而研究民国合唱乐曲的发展以及民国合唱乐曲的风格。

## 一、《送别》的音乐理论分析

1.《送别》的形态语境。合唱乐曲的形态语境,主要体现在曲调和歌词两方面。从作曲技法上来说,一首合唱歌曲拥有较强的曲调表现力,优美典雅的旋律,准确鲜明的音乐形象,就可以使得乐声与人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合唱优美的音乐形象。在民国音乐史上,李叔同是第一批采用西洋作曲技法的音乐家。《送别》的曲子原本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J. P. 奥德威所作,歌曲的名字原本叫做《梦见家和母亲》。由于此曲曲调十分优美动人,日本作曲家犬童球溪便采用此曲的旋律,重新填词《旅愁》<sup>[1]</sup>。据资料显示,《旅愁》

此曲在日本流行期间,正好是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期,此时期正值李叔同热衷于音乐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基础上,李叔同重新写词,考虑到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对曲调也做了适当的修改。我们听原曲《梦见家和母亲》与《送别》,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曲调的不同之处,其中每四小节出现一次的切分音被李叔同巧妙地删去,这么一删,不仅干净利落,而且整首歌曲曲调更加耐人寻味,余音袅袅之时,伴随着歌词深入人心。再赏析《送别》其歌词,从音乐整体性的角度来考虑,歌词最重要的是要有侧重地传达出人独特而又敏感的内心世界,尤其要注重文学性与音乐性的统一。通过研究《李叔同歌曲集》可以得知,李叔同早期的音乐选词,多采取中国的旧体诗词,比如李白的《清平调》、欧阳修的《阮郎归》等。到了后期,李叔同一般选择自己填词谱曲,如《送别》,便是为人们最为熟悉并认知的一首李叔同的学堂乐曲之一,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作是李叔同音乐的代表作。我们将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所作词《旅愁》

3.叙述主题具有历史塑造性与现实取向性。“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它可能受到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受访者与口述历史对象的特殊关系等等的影响。”这里口述历史的动态性表现的十分明显。这些经历抗战的人,活下来成为了“新中国的人”,现在又称为“新世纪的人”。他们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客观的历史,还有历史背后叙述者的所思所想。在叙述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下所呈现的口述史料往往是叙述者选择之后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口述史研究所获得的口述史料是叙述者对过去事实和自身选择记忆的综合。口述史料在承认其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民兵组织研究中,口述史料在功能上不仅不能取代文献史学,而且更需要与文献史料相参照的批判研究。

## 四

历史事实被学者们区分为“过去真实地发生过的事实、史料中所蕴涵的事实以及历史学家所认可和运用于其研究的事实”。在历史学家试图还原真实客观历史的过程中,过去真实的历史已经消失,现有对历史的研究受到现有史料限制而无法重构。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是历史学家对相同或相似史料使用不同理论工具、不同史学方法而进行的研究结果。其中“受到其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个人气质、问题意识等各种交互纠缠的个人因素的影响”对于史料中的事实取舍、对于事件的评定必定是有选择的结果。例如民兵主题的选择正是当下学术潮流影响之下的产物。文献的梳理对访谈者而言也是时代、政治语境的一次经历过程。对于民兵组织的底层研究视角定位,对于民兵在抗战中的正面价值认识,对于民兵组织长期被历史所漠视淡忘观点等均会影响访谈者的主观判断。

在访谈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口述史调查中,访谈者的活动也是一

种有目的的、主动的过程。民兵口述调查之前,访谈者需围绕民兵主题,进行前期的文献史料的梳理。需根据民兵活动的范围轨迹选定地域与代表性叙述者。在实际调查中,访谈者需根据主题协调谈话内容,引导、帮助叙述者完成对过去历史的回忆与阐述。调查完成后,访谈者需根据录音与笔记完成记录口述史料,最终将口述史料再表达为历史文本。“选择和确定历史事实的过程就已经是历史解释的开始。”将民兵口述史料再表达为历史文本的过程,是访谈者对民兵历史的再度呈现的过程。受其主观性与现实立场的影响,从口述史料转化为历史文本的过程,是被访谈者有选择的按照个人的理论、概念、能力参与过去民兵组织历史片段的认知和构建的过程,由访谈者完成的民兵口述史历史文本是建立在对叙述者口述史料基础之上的选择、描写、判断与诠释的结果。因此,通过口述史方法所记录完成的民兵口述史,是口述者对过去事实的选择记忆与访谈者对口述史料选择之后的文本形式。

民兵组织口述史的实践提醒我们,在口述史研究中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完善,需要不断反省,甚至于由时间来检验。但同时也需承认,这样的文本形式虽然不能够反映民兵历史的全部,但只要是建立在规范的史学方法与史学论证规则之上的,其结论必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 参考文献

- [1]2011年7月9日,武乡县蟠龙镇关家窑村,关长江口述。
  - [2]2011年7月18日,黎城县南委泉村,赵双龙口述。
  - [3]2011年7月13日,长治市液压厂家属院,萧江河口述。
  - [4]2012年2月5日,武乡县寨上村,弓仲余口述。
- ★本项为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名称:太行抗日根据地民兵组织研究,项目编号2011328;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记忆、语言与历史书写:口述史视野下太行根据地民众抗战记忆考察》,项目编号20122216。